

重点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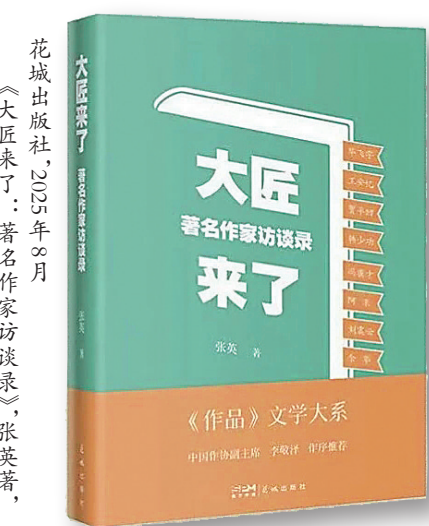
访谈作为一种文学生活

□陈晓明

我与张英相识近三十年。那时，他刚大学毕业不久，正值青春年少，怀抱梦想来到北京。他给人的印象略带腼腆，却善于发表柔中带刚的见解。他执着于探寻真相，敏感而坚韧。张英长期从事新闻工作，他所完成的系列作家访谈，在深度与广度上几乎无人能及。近期，他又出版了《大匠来了：著名作家访谈录》。我一向喜爱阅读访谈文字。作家访谈、传记与自传，往往是我闲暇阅读的首选。我认为，在国内作家文学访谈这一领域，张英或许最具优势。她始终密切关注文学现场，熟悉重要作家，与众多作家、批评家交往密切。

坦白说，我自己也部分具备这些条件，多年来也曾萌生过访谈早年认识的作家友人的念头，却始终止步于设想。我深知访谈的不易，需要做大量案头准备，更需营造自由、信任且能深入探讨的交流氛围，让对话在友好而认真的交锋中敞开。每每想到这样的烦琐与困难，我便望而却步。但张英做到了。凭借勇气与勤勉，他持之以恒，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精彩的访谈。该书涵盖了毕飞宇、王安忆、贾平凹、韩少功、冯骥才、阿来、刘震云、余华等8位作家。除冯骥才先生属于师长前辈，其余多是我的同龄人。我对他们的作品与文学观念颇为熟悉。即便如此，张英的访谈仍带给我许多惊喜、意外与珍贵的启发。从文学研究的角度看，这些访谈具有独特价值。它们直接而真实地呈现了作家们的创作心路、文学理念、对自己作品的剖析，以及对世界文学经典的品鉴。

这些访谈始终贯穿着一种朴素的真实。作家未必都愿意向媒体袒露自己的过往、家世、困境与彷徨，但在张英的笔下，他们却共同做到了这一点。当然，任何访谈或自传都难免有所保留，然而这部访谈录确实达到了难能可贵的、最大限度的真实。更令人欣赏的，是作家们直言不讳的



态度。他们将成长中的困惑、曲折与复杂，坦诚地呈现给读者与研究者的。

作为与这代作家共同成长、走在同一条道路上的人，他们的许多文学见解我虽不陌生，但如此敞开心扉、深入细致的交流，依然令我动容。自认为了解颇多的我，透过张英的访谈，又发现了他们许多未曾被认识的面向。阅读这些访谈，无论是作为读者还是研究者，都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必须认真对待作家及其作品，因为他们同样极致认真、极致较真。多位作家都强调，“准确性”是其笔下的文学品格。在文学追求上，这代作家真实、认真且虔诚，怀抱着为之献身的热情。作为同代的研究者，我深有同感。我们何其有幸，能与这些共同成长的家作并肩前行，共享那份认真、虔诚与奋斗的精神。

作家的生活经历对其写作至关重要。这8位作家的文学观念或有差异，但在写作精神上堪称同代人。书中每位作家的生活阅历与精神世界各不相同。读者有幸读

到这些访谈，便能聆听如此多作家敞开心扉——对象不仅是张英，也包括潜在的读者。就对话方式而言，张英极擅开启作家的心扉：时而凭直觉，时而在闲谈中敏锐捕捉有价值的话题，时而不避冒失地追问。也正是这份“冒失”，促使作家吐露出更多心声。多位作家谈及与文学相遇的起点，这对有志于创作的青年朋友极具启发。他们均详述了各自起步时的文学处境：身处人生低谷或逆境起点，却不愿被命运摆布，而那些坎坷经历，反而成就了人生的丰富性。每个人的讲述都是一部个人简史，也是时代文学的缩影。他们大多在20世纪80年代崭露头角，90年代成长壮大，21世纪初臻于圆熟。他们的历程，恰是近三四十年中国文学的历程，堪称一部改革开放的文学史，也是作家的精神与心灵史。

张英不仅呈现作家的经历与心理，更着力塑造他们的精神品格。冯骥才先生的访谈尤令我印象深刻：他在改革开放初期，便率先在作品中触及传统文化乃至民间风习。其后更以数十年孜孜不倦的努力，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作出卓越贡献。他的作为、大爱与奉献，都令人肃然起敬。作家各不相同，中国作家也千差万别，但读罢此书，我对其中许多人油然而生敬意——他们的坚定、自觉、奉献与诚恳，弥足珍贵。这也映照出中国文学的品格与质地。访谈的精彩之处，还见于作家对自身作品的解读。刘震云谈及创作《故乡面和花朵》时的精神状态，《手机》与现实、电影的关系，《一句顶一万句》的上下部结构及庞大人物等问题。刘震云笔下的人物，一个牵扯出另一个，但他总能拿捏得恰如其分。余华特有的严格与准确亦体现在自我评析中——无论是《兄弟》里宋凡平的刻画、李光头与宋钢的成长史，还是下部《兄弟》的夸张、荒诞与喧闹，他的阐释在这部

访谈录中都得到了精当的体现。

归根结底，这是一部关于“人”的书。张英虽然从文学进入、挖掘思想，但我从中看见的却是人的生活——人如何度过一生，如何理解他人，又如何自知、知人、彼此相知。毕飞宇特别谈到了《推拿》中对残疾人的书写，要理解他独特的处理方式，就必须读他的讲述。文学当如何书写残疾人？这并非易事。大多数作品只将残疾人作为配角稍加点缀，毕飞宇却用一整部长篇描绘了一群残疾人的生存图景。他曾担任特殊教育教师的经历，让他内心逐渐走向自然与平等——这实在难得。作家观察生活、看待他人的方式，本身便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思考与经验。

尤为深刻的是，这些作家能够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说的那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坦诚直陈自己成长中的困惑与曲折。在这本访谈录里，我们看到的正是作家们如何将生命经验锻造成伟大作品的“炼金”过程。作为同代人，我感同身受，也因此更能体会他们作品的质地、对人性光芒的执着书写，以及对人间宽容与爱的信念，这正是文学的力量所在。

作为访谈者，张英完成得很出色。他循循善诱，竟问出如此丰富的内容，引出了这么多感人至深的文学故事。文学本质上是人的一种生活，是人需要拥有的一种文学生活。在这个意义上，该书重新提出了“文学是入学”这一命题。我认为，在AI时代，这样的访谈弥足珍贵。未来，AI或许写得比人更好，但只要人还坚持着“人的文学”的信念，AI便无法瓦解人的文学生活。那是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心灵对话，是作家关于我、关于你、关于众人生活的一种书写。它以血肉之躯为底色，又以大写的人为旗帜，在人类精神的高处发出召唤。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编辑手记

报告文学以“真实为骨、文学为魂”的特质，将宏大叙事融入具体故事，成为破解主题出版传播难题的有效路径。为落实“纪录小康工程”主题创作项目，人民出版社于2019年策划、2022年出版的报告文学《独龙悠歌》便是典型的创新实践。

小切口承载大主题的价值锚定。主题出版的题材选择，本质是对时代精神的精准捕捉与艺术转化。优质题材需兼具主旋律导向、时代变迁印记与故事性内核，《独龙悠歌》的选题正精准契合这一标准。独龙族作为我国28个人口较少民族之一，聚居在滇藏交界的独龙江河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仍处于“刀耕火种、刻木记事”的原始社会末期，2018年底实现整族脱贫的跨越，堪称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给云南省贡山县独龙江乡群众的回信，更赋予这一题材鲜明的政治内涵。从“溜索过江”到柏油路通村，从独龙毯手工传承到电商外销，这些具体变化构成了新时代发展的生动注脚。随着作者与编者对主题的认知不断深化，这一创作已升华至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高度，既彰显了边疆发展与民族振兴的紧密联结，也凸显了各民族守望相助、共筑家国的时代内涵。

“行走的书写者”与题材的契合。报告文学既需恪守真实底线，又要具备文学张力，对创作者提出极高要求。优秀的报告文学作者，必须是兼具政治判断力、生活洞察力与文学表现力的“行走的书写者”。我关注到山东作家王鸿鹏，源于其获第十四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的《中国机器人》。这部作品以严谨逻辑、生动刻画和深厚情怀展现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其将科技进步与时代精神融合的手法，让我认为他是《独龙悠歌》的理想创作者。军旅生涯锤炼了他的政治敏感度，而长期从事宣传工作又让他积累了扎实的叙事经验，以及深入基层的创作自觉。

2019年5月，得知王鸿鹏在京出差，我下班后即刻赶往他的住处。在楼下小饭馆里，我们从总书记回信的深意谈到独龙江乡变迁，从创作伦理谈到脱贫攻坚的时代意义与文学责任。两小时畅谈意犹未尽。王鸿鹏当即承诺：“这个题材承载着中华民族的重生史，哪怕无稿酬、冒风险，也要写好。”随后，王鸿鹏开启了两年多“沉浸式”创作。独龙江乡山高路险、半年封山，他三次深入挂职采访，第一次便遭遇泥石流险情；为采访“人民楷模”高德荣，他借住其家中，深夜围炉记录鲜为人知的细节；他跟随扶贫队员走遍6个行政村，夜宿村民家中采集传说，与马帮后裔赶山路，在田间地头倾听脱贫故事。这种“脚踩泥土”的创作，让作品既鲜活呈现高德荣数十年带领群众脱贫的典型事迹，也细腻记录普通村民从“要我脱贫”到“我要脱贫”的转变。作品以边民传奇与风土人情为副线脉络，嵌入独龙族文化元素，在诗性表达中铺展民族史话，让脱贫叙事兼具历史厚度与文化温度。

真实与生动的辩证统一。编辑是报告文学价值的“把关人”与“升华者”，需在思想正确性、内容真实性与表达生动性间找到平衡。《独龙悠歌》在编辑过程中，我们重点把握三个环节：一是筑牢双重底线。主题出版的政治关不可逾越。我与同事池溢、王新明组成编辑小组，三轮通读核验。政策与领导人讲话内容对照官方文献校准，脱贫史实查阅政府工作报告与扶贫档案交叉验证，人名、地名等细约请独龙族专家审校，仅地名规范便修改20余处，以严谨态度维护出版公信力。二是打磨叙事表达。针对初稿人物群像零散问题，我们建议作者强化“以人串事、以事见史”逻辑，增加高德荣“辞职”回乡、扶贫队员遇险等典型事件细节，补充5G专家、返乡大学生等新一代独龙族人物形象等。对政策解读偏重段落，将政策融入生活场景——如通过村民讨论安居房的对话展现保障房建设成果，避免“政策说教”，让读者真切感知政策温度。三是强化图文互补。考虑到读者对独龙族的陌生感，我们选配了十余张高清图彩插，涵盖峡谷地貌、独龙毯编织、村民新居、校园升旗等场景，与文字形成互补，直观呈现“从竹篾房到现代民居、从刻木记事到5G通信”的变迁，增强作品感染力。

新时代的中国正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人民群众的生动实践、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为报告文学创作提供了愈发丰厚的源泉与广阔空间。作为出版工作者，我们理应进一步发掘报告文学的独特价值，助力更多反映时代风貌、展现人民力量的佳作涌现，为主题出版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力，实现价值共生，双重赋能，使报告文学真正成为新时代中国的备忘录、风物志与心灵史。

（作者系人民出版社政治编辑一部副主任）

报告文学与主题出版的双重赋能——《独龙悠歌》出版的创新实践

□刘敬文

创作谈

重要的是让读者感受到真实

□程 晖

我在江西南昌老城区丁公路那座建于20世纪90年代的小区，住了15年。书房的窗口，正好对着一棵枝丫虬结的老樟树，老樟树的下面，是一段老南昌的青石板路。每天晚上坐在书房，便和这棵老树互相看着，日复一日地沉淀着过去与未来。开始写《进贤仓》以后，我们的交流似乎更加频繁，那些藏在树影里的岁月、青石板下的往事，都顺着目光流淌而来，直到《进贤仓》最后一个字落稿。

我生平第一次到南昌，是因为1993年夏天的一场诗歌大赛。那天，主办方安排我们去参观八大山人纪念馆。当我的脚步刚刚迈入青云谱那座青砖灰瓦的院落，目光触及朱耷笔下的禽鸟、孤寂的山石时，心中忽然泛起一阵强烈的震颤。这是我与南昌文人精神的第一次正面碰撞：那些看似怪诞的笔触里，如此深刻地藏着一个文人的孤愤与苍凉。从此，南昌对我来说，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符号，而是一座浸润着文人血脉的城市，那些隐匿在弄头街巷里的故事，连同八大山人画卷里的那些墨痕，在我的心底最深处悄然晕染开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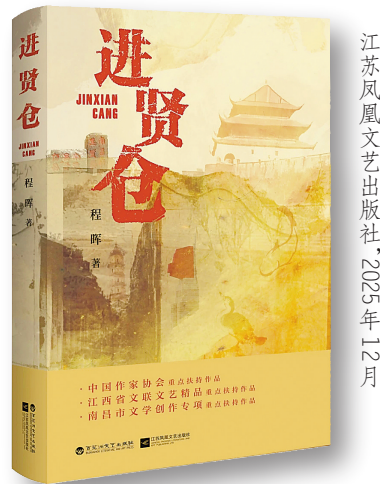
后来到南昌工作，天天走在岔道口西路的那段青石板上，听人们讲伶伦律、许逊治水的故事，才慢慢懂得，南昌城低调的内心藏着太多的故事，骨子裡更有一股令人敬佩的“隐士气”。从汉代悬棺拒拒的徐稚，到宋代躬耕隐居的苏云卿，再到

清初遁入空门的朱弁，这片土地始终是特立独行灵魂的栖居之所。他们如深谷中的幽兰，不慕尘世间的繁华，却在历史的暗角里坚守着独有的精神根系。

在创作《进贤仓》之前，我几乎所有的小说都盘桓在故乡那片土地和与之相关的生活经验里，直到我的“乡绅三部曲”完成以后，心中有一个念头不可抑制地迸发，我要写南昌，不是作为背景去写，而是要进入南昌的纵深，抵达精神内核。

我家楼下岔道口西路的路口，有一对老夫子开了家小店，他们家独创的纸包鹤鹑和鲜炒田螺，每天吸引着成百的食客，但他的店门口有一块颇显任性的木牌：酷热歇业，严寒休市。每年到了那个时候，夫妻俩门一关，天南海北旅游去了。旁人都笑他们迂腐，有一次我甚至问了男主人，他的话让我感慨良久：糊口而已，何必拼命？这种看似不合时宜的执拗，恰是南昌文人精神的现代性投射。他们未必能背诵八大山人的诗文，却本能地继承了那种“超脱不阿”的生活姿态，这股不攀附、不将就的劲儿，像老樟树的根，深深扎在南昌的土里，也让我看清了《进贤仓》要追寻的风骨，那些过去的东西，有些会在当下延续，并最终通向遥远的未来。

《进贤仓》就从这里艰难地生长出来。我一向认为，小说重要的不是真实性，而是要让读者感受到真实。进贤仓是一



个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街区，我在这条“街”里抠出了小说里的故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进贤仓街是否真的存在，并不那么重要。牛氏家族五代人，改朱姓为牛姓，却不改骨子里的文人基因。我写他们在时代洪流里的挣扎，不是想记录历史，也不是想为他们立传，是想写那些乱世里迷茫和坚守的人们，在过去命运与个体选择的碰撞中，产生能触动读者强烈共鸣的东西。

汪曾祺先生曾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对此，我深以为然。我长期在机关从事文稿撰写工作，程式化的语言惯性让我此前的作品屡被诟病缺乏文学质感。为了摆

脱“公文腔”的束缚，我重新拿起那些中外经典名著，研读他们的语言特色。经常到南昌的老茶馆，听老人们讲“仓前仓后十八巷”的掌故。夏天的夜里，我会到人员密集的老福山立交桥下面，收集那些带着江风与稻穗气息的俚语，记录老人们充满地域特色的对话。我甚至还会模仿牛森有的语调与朋友交流，让对话里流淌着老南昌的原汁。

《进贤仓》写完了，我常常看着窗外的那棵老樟树发呆。老南昌的话、进贤仓街的风还有那些藏在历史里的魂，借着我的笔流出，如同一列满载岁月传奇的火车，从时间的纵深处向我们驶来。在这个短视频、直播深受欢迎的时代，讲述一段这样厚重的百年故事，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但我仍然固执地认为，越是碎片化阅读时代，能够读这种有历史感故事的人，都是这列火车中有缘的乘客。我只是一个故事的转述者，把老樟树的私语、青石板的记忆变成了文字。至于好不好，我不知道。只知道书房外的那棵老樟树又抽了新芽，根须深深地扎在泥土里，攥着那些欲说还休的年月。而我，想着把这些年月舒缓地摊开，让更多的人看见其中深藏着的微光。那应该也是过去与未来在当下交汇的回响，也是生活与文学碰撞后，产生的永不熄灭的光芒。

（作者系作家）

人性光辉闪耀时

□刘大先

事。坦率地说，舒山根的日常生活一塌糊涂，许多时候处理问题的方式过于讲求利他与奉献，而牺牲了自己和家人的利益，显得不近人情。从世俗的层面来看，他几乎是让人讨厌的，周围人的一切都要给他的教育事业让步。但是，换个角度来说，他至少活得拧巴，甚至称得上精粹专一。虽然总是被情感、家庭、工作的日常所牵扯，却一直矢志不渝、初心不改，并且最终通过自己宽厚的胸襟和全身心的投入，影响了山村的孩子，改变了一直不理解他的妻子芳菲，感染了一众原先只关注经济利益的商人。

这是一个因个性极为突出而显得极极端的人物。这里所谓的“极端”，其实是相较于普通人在现实中的敷衍与将就而言，指向的是对理想与信念近乎纯粹的执着与专注。这样的人物形象，在革命英雄传奇和浪漫主义叙事传统之后的当代文学中已经相当罕见。如今大部分作家倾向于将人性理解为复杂的、含混的、道德界限模糊的存在。这当然有其合理之处，

因为以往那种纯粹的革命英雄与道德完人确实简化了现实的复杂性。然而，在世俗化书写尤其是受现代主义影响的小说创作中，对于人性的理解有时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将复杂人性简化为对欲望、本能与功利实用主义的单向度追求。

但人性恰恰体现在对本能与功利的超越之中。人性无疑是复杂的，它包含多重维度：最底层是生物性，关乎饮食男女、生存繁衍；其上则是社会性，表现为趋利避害的实用取向；而更高一层是历史性，即那种反本能、超功利的理想性——能够为某种信念毅然逆行，“虽千万人吾往矣”。正是在这个层面，人性才真正闪耀出光芒，因为前两个层面在动物世界中亦有种种表现，唯有人类能够自我设立理想目标，甚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一般人对于拥有这种高层人性的人物，尽管自己在现实中难以做到，甚至可能出于现实考量加以阻挠，但内心深处往往存有一份敬畏。这也解释了《心灯》中芳菲为何屡次因山根不顾家庭而失望透顶，却始终没有离开他：除了爱情，多

少也因为 她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对他怀有一种深层的尊敬。同样，鸿鑫、曼丽夫妇虽不赞同山根的许多做法，却最终被他打动并尽力相助。这正说明，理想主义自有其内在的、撼动人心的感召力。

这种感召力，用小说中点题的话来说，便是“点亮心灯”。这也正是山根始终怀揣的梦想——通过自身的实践与教育去影响、启迪他人，最终让人们获得觉悟与内生的动力。这里的“他人”，并不仅限于他的学生，也包括他身边的每一个人。“心灯”在中国古典文化，尤其是禅宗传统中，是一个源远流长的意象。所谓薪尽火传，先行者如烟火微光，其意义在于点燃后继者本自具足的心灯，从而千灯互映，光光相照，驱散蒙昧与黑暗。

从这个意义上说，《心灯》所讲述的，正是人性光辉闪耀的时刻。作者屡次将主人公置于艰难抉择与严峻考验之中，其处理虽偶有偏颇，令读者为之揪心，但每一次，主人公都凭借其坚定的意志坚持了下来。他的许多做法看似不近人情，却正是在这种“不近人情”之中，透露出理想主义的底色。因此，我能够体谅小说中某些不尽合理的情节设定与略显粗朴的叙述——在一个日趋功利化的环境下，我们格外需要舒山根这样带有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的脊梁”色彩的人物。这也正是文学书写之于时代的深远意义所在：“一灯之明，传万灯燃，万灯之明，明不可喻。”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